

布爾塞維克

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
政治擴大會議特刊

第六期

目次

布爾塞維克主義萬歲！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

中國共產黨開除譚平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出版

「布爾塞維克」

每週出版一次

每期連封面共二十頁

增刊無定

每份定價大洋三分

布爾塞維克主義萬歲！

中國最近的狀況顯然是新舊軍閥混戰紛爭的局面，——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之統治自己分崩潰亂而不能穩定。中國革命雖然受着屢次的失敗和挫折，但是工農民衆的革命潮流仍舊繼續的高漲：農民暴動普遍全國，革命工人已經宣布國民黨的死刑：『青天白日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中國現時已經到了長期的無間斷的直接革命形勢。中國共產黨最近開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十一月半），指出這種現狀之下的唯一的革命策略，便是發動羣衆起來武裝暴動，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的統治。我們在這裏公開的宣布本次會議之政治議決案和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使全中國的人知道共產黨的策略，知道共產黨是光明正大的率領工農民衆的鬥爭，是公開主張只有工農民衆自己起來暴動，自己起來取得政權，才能得到解放，而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

中國的『革命』——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起，一直到武漢的國民政府背叛革命止，都是在民衆之外，另外找一種軍事的力量，甚麼國民革命軍之類，把舊的軍閥打倒，就算成功了。這叫做軍官式的『革命』。於是甚至於共產黨內的机会主義份子，都以爲革命向例應當如此做法的。兩湖的農民暴動，尤其是葉賀軍隊的南征廣東，其失敗之主觀上的原因，便是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發動羣衆，而只靠軍事的力量，只想着『革命的好軍隊』可以解放民衆，可以發布告實行沒收土地，甚至於發布告禁止民衆行動，限制二百畝田以上的地主方可沒收！葉賀的失敗應當給這些機會主義者以當頭的棒喝。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應當是發動羣衆，組織羣衆自發的暴動，從日常艱苦的經濟政治鬥爭，領導工農民衆去認識暴動與取得政權之必要，而起來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真正的革命，只有發動極廣大的羣衆，要由健全而強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去堅決的組織這種客觀上必然爆發的革命力量，形成極巨大的革命高潮，起而推翻治者階級。革命的

武力，也只有在這種羣衆鬥爭之中去創造；工農羣衆奪取革命敵人的武裝，兵士羣衆自覺的掉過鎗來殺戮反革命的軍閥，——只有如此形成的工農革命軍，是真正羣衆的革命軍隊。

歷史的教訓指示我們：民衆不能等待甚麼北伐來解放，不能等待甚麼東征來倒蔣，不能等待葉賀來替廣東工農革命，不能等待任何軍事勢力（甚至於某某工農討逆軍，某某農軍）來打倒治者階級。此後的革命，堅決的只有工農自己起來武裝暴動。自動手的殺戮豪紳工賊反革命派，自動手的沒收土地分配土地，摧毀一切舊的社會關係。「民衆反軍閥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最近決定如此的策略，實在是開闢中國革命史的新紀元。

今年上海的三月暴動，以及半年來許多地方的農民暴動，顯然的證明：中國工農民衆已經有革命暴動的力量，工農民衆已經運用這種策略而得着相當的經驗與勝利。如果仍舊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去引導羣衆發動羣衆，而以爲革命只要有槍桿子便可以成功，那麼，不論是因此而過早的實行軍事冒險，或是因此而阻止羣衆自發的「徒手」暴動，都是軍事的機會主義。如果暴動之中，只有軍事的行動，而不領導羣衆自動手的去摧毀一切舊統治機關和剝削制度，那麼，當然也是軍事的機會主義。

再則 民衆暴動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國民黨政府，自然是要推翻這種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要建立工農貧民的政權。所以本次會議明顯的指出：中國共產黨號召工農民衆起來暴動，而以組織蘇維埃政權爲目標。工農民衆單是感覺苦痛而起來反對，實行罷工抗租抗稅不還債的鬥爭，是不夠的；單是因反抗而走到暴動的道路還是不夠的。何以呢？因爲反抗之後，暴動之後，不知道自覺的組織自己的政權，鞏固革命的勝利，那就始終是要失敗的。共產黨應當明白的告訴工農羣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爭政權的鬥爭，只有勝利的革命暴動的工農貧民兵士羣衆，自己選派代表組織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權，才能真正得着解放；共產黨應當引導羣衆，使工農羣衆知道自覺的去取得政權。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革命，是澈底的土地革命——最澈底的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民權主義革命，而且是急轉直下這種社會主義的革命——馬克思所謂無間斷性的革命。況且，中國革命經過三次失敗而仍舊繼續不斷的高漲，羣衆的鬥爭與暴動普遍全國的爆發，更是中國革命的無間斷性之表演。這是因爲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根本不能實行甚麼改良主義，不能消弭革命潮流，如孫中山所說「預防社會革命」。因此，國民黨的統治只是白色恐怖的統治，——國民黨的理論也已經完全「抽去革命性」，成了文飾軍閥割據的荒謬反動的理論和主義。共產黨應當號召羣衆反對國民黨，推翻國民黨，退出這種反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政綱與主義之解釋，原是共產黨給他的一點革命性，如今清黨反共之後，已經完全拋棄。國民黨現時正在要開分贓式的中央執監會議，「黨國要人」的第一要務，便是「清去共產黨的理論」（汪精衛），便是主張「分治合作」（李石曾）。痛快地说，便是主張軍閥割據壓迫民衆罷了！中國共產黨，自然要代表工農民衆而領導他們起來打倒這種反革命黨。國民黨的統治，已經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那主張甚麼消弭社會革命調和階級衝突的國民黨的改良主義，根本與中國的社會實況相反，他必然是欺騙壓迫民衆的工具。中國社會的改造和解放，只有在共產黨的主義與策略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拋棄軍官式的革命，實行民衆式的革命，打倒國民黨的黨治，實現蘇維埃的政權。

同時，要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策略，必須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要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階級的戰鬥的革命黨，來做革命的指導者，然後革命方能勝利。沒有革命的黨，革命是不會自然勝利的。列寧說過：無論治者階級的統治如何崩潰動搖，沒有革命的主觀上的力量去推倒這一統治，他是不會自然而倒下的。所以本次會議對於共產黨的機會主義，與以極嚴厲的糾正，公開叛黨的人，如譚平山等，更與以開除的處分。肅清機會主義，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畏怯怠工的份子，使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化，無產階級化，強固黨的組織，更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觀的革命形勢

本年八月裏中國共產黨中央通過的政治任務決議案，已經考察武漢七月反動之後中國的一般政治狀況，斷定那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穩定，在現時中國這種社會經濟政治的基礎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時指明：一般政治軍事經濟的大危機，因資產階級軍閥反革命的結果，必然要大大的擴大發展起來，這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實。

中央曾經指出：雖然中國革命受着兩次巨大的失敗：四月間滬粵的反動，七月間武漢的反動，然而中國革命決不會就此長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認為這種悲觀的觀念是絕對不正確的。中央那時認為必須繼續擴大深人革命的鬥爭，並且要堅決的採取組織工農武裝暴動的政策。以後的政局，完全證明中央這種攷察是正確的，中央的大政方針是對的。固然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於潮汕，固然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

勝利，但是革命雖然又遇着了這幾處部分的新失敗，然而三個月來一般的鬥爭經驗，更證明了本黨的策略完全是對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農民衆的鬥爭又重新猛烈的爆發，一般政治狀況及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經過了很嚴重的變更。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攷察現時的新時機而決定適應這種客觀時機的策略。

(二) 中國社會的總危機與農業經濟

中國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雖然勝利，然而那些產生偉大的中國革命之社會經濟政治關係仍舊存着。滬粵武漢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解決那些中國社會關係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這些矛盾劇烈起來，增多起來，更加使這些矛盾的爆發急遽起來。這就是因爲得着勝利的反動勢力，竭力在那裏鞏固中國的舊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是陳腐腐朽落後野蠻的制度。於是這種情形的背景裏，那一般的總危機便盡量的大大開展起來。這就必然要引起無產階級城市貧民，尤其是農民的廣大羣衆之革命鬥爭

的高潮。

農業經濟的衰落破敗，一天天的更加帶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質。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當的「豐年」（除直隸山東兩省已經完全被戰禍天災所破滅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時，照例應當使農業經濟相當的改善，但是事實上差不多全國都因過去的災荒與戰禍，同樣是成千累萬的人餓死殺死，不過是比災歎的直魯略好些。），可是這所謂「豐年」，不但沒有阻止些農民經濟的崩敗，而且更加增進農民經濟崩敗的過程。因為「豐年」的結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錢米租費給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藉口豐年迫繳歷年欠賦），地主和重利盤剝者要追取農民的舊欠，買辦和商人要抑低農產品的價錢，軍閥更藉口增加稅捐至兩倍三倍（江蘇今年增收田漕的畝捐）。所以所謂「豐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農民破產，至少也和荒年一樣。

地主的剝削農民，商人重利盤剝者的剝削農民，軍閥的掠奪農民，豪紳官僚等等的壓迫農民，現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弄得農民不但不能恢復自身的生產能力，甚至於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的農民已經被這些有產階級剝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農業經濟的「重復生產」，即使在極陞小的範圍內也簡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賈重利盤剝者的直接剝削外，軍閥還要掠奪農民，他們不但徵發糧食牲口，並且要拉夫，再則因為戰禍連年的關係，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國家秩序混亂分崩，天災日益頻數（這些天災亦大半由於中國社會制度而來的），還有財政金融的紊亂，使鄉村中多量的出產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報酬，商業和市場的停滯紛擾，使農業經濟上技術方面的準備也日益破毀，鄉村中土匪蠶起等等。——凡此種種，都使農業經濟崩敗衰落。農業經濟的危機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趨勢，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工農革命的徹底勝利和劇烈的土地關係的變革。

（二）工商業的危機

中國工商業及金融中的危機，尤其有明顯的表演。中國革命客觀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造成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一革命任務，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中

一四一

就應當解決的。但是國民黨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走近解決這一任務的一步，而且更加使這一任務的解決遠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不但增加中國的分裂離拆，而且發生許多新的混戰，各省之間有戰爭，每省之內也有戰爭，現在全中國都是混戰。商業交通在各省之間固然是時常斷絕，就是在一省之內也往往東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亂的金融狀況，原料機器燃料的運輸減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簡直斷絕了。反革命的屢次政變之後，外國資本家的競爭勢力又增加了好幾倍。再則中國農民的家庭工業，手藝等類的事業，更加破產停滯。國內國外的貿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輸入減少百分之五十）。外國資本利用銀價的低落，財政的紊亂及國民黨的屈服，更加在中國多量搜括金錢財貨。全國的破產窮困，經濟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墮落下去。幾百萬農民，幾十萬工人店員，都在失業，都從商業及一般生產過程中排斥出來。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反動，就是如此的「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四）帝國主義侵略之急進

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在國際關係上，便是完全降伏於外國資本主義，而增加帝國主義的侵略。英國帝國主義已經實際上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統治了上海。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得着了絕大的勝利，滿州內蒙正在變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國資本，他已經拋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不敢再爭收回租界的問題；關稅自主的問題，他竟無恥的完全屈服。他絕對的背叛了民族解放運動。現時國民黨的所謂「反帝國主義」宣傳，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過掩飾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那種無恥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只想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矛盾，而實在則替其中最強的當工具。從革命開始到現在，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統治力，從沒有現在這樣強大的。偉大的中國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地位，雖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階級向帝國主義做買賣的「投機事實」的對象，但是從沒有像現在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國民黨）治下這樣厲害的。

（五）民族資產階級與國民黨

國內政策方面，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便是只能採取法西斯蒂主義及亞洲式的野蠻專制之兇惡手段。白色恐怖，窮兇極惡的鎮壓工農運動，屠殺勞動民衆；這種反革命政策，在國民黨治下，達到了空前的野蠻程度。中國舊式的野蠻毒刑，對於革命黨人的非刑拷打，還要加上建立黃色工會的把戲和警察包探所組織的工賊性的「工會」，滲入工人運動。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日益增長，同時他自身之內的分化崩潰的過程却也在急轉直下的前進，中國資產階級，固然絕對沒有能力實行反抗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反動的革命使命，而在羣衆運動高漲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能力做穩定團結反動勢力的動力。對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他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統一中國，建立集權的國家，或者就在資產階級地主聯合的基礎上統一中國，都簡直是他沒有絲毫能力去實行的事。這是他歷史上的運命。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地主的聯盟，其結果是使中國更加分崩離析，使割據互爭的局面更加糾紛，自然要造成繼續不斷循環不息的軍閥混亂的屠殺戰爭，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各階級

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最不成熟最沒有力量的階級，最不能負起歷史上的改造社會制度之責任的階級。一切建立鞏固的國家政權之嘗試，就算在一個小小省縣的範圍裏罷，都是完完全全破產。無間斷的屠殺混戰及空前的貪婪淫佚腐化，——便是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國家機關之致命傷。國民黨曾經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墮落，完完全全變成無主義無目的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狗窠，屠殺工農的劊子手的黨，貪賊舞弊殺人兇犯投機奸商的官僚黨，這事實很明顯的反映着資產階級反動的全部腐化崩敗的景象。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八月間便預言：國民黨要變成一個像樣的資產階級反動的政府黨，尙且是不可能的專，這是很對的。本次會議完全贊同中央九月間關於取消組織左派國民黨之計劃及提出蘇維埃口號之決議。本黨認爲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份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本黨不但要號召一切革命份子退出國民黨，而且要努力揭發國民黨的欺騙壓迫民衆的罪惡，要領導民衆起來推翻國民黨。

中國資產階級是歷史上的流產，甚至於連造成自己政黨的能力都沒有。他們不能造出一個有一定政綱的黨，更不用說要他造出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政綱了。

(六) 中國革命的前途

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特別的作用，使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完全沒有穩定的可能。經過革命的三次失敗，彷彿反動穩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須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夠由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一些，同時，必須在現時國際國內之中，有漸進的，作算是非常遲緩痛苦的改變社會制度之可能，可是實際上現時在中國沒有這些條件。中國沒有這樣一個階級，能夠負起責任來，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不過是奪取革命領導權矇蔽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手段，領導權到手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立刻便不得不將他轉交給豪紳地主階級，就是完成反革命勢力的復辟，結果是反革命的領導權仍舊在豪紳地主階級手裏，而不在于資產階級手裏。如汪精衛等類的政客，想「改良」土地關係（如應允減租百分之廿五等），可是這種政策在幾

天之內便完全破產，單是這一例子便證明改良政策不過是公開的欺騙。再則全世界客觀的形勢是革命的，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又在急進的施行，這種情形也就是使中國沒有由改良主義得着外國資本家的幫助，而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要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兩個條件：（一）使中國完全永久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二）帝國主義戰勝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戰勝蘇聯。此外中國不能由改良主義的方法去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却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革命雖然受着屢次很大的失敗，而中國勞動民眾革命運動的力量不但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用盡，而且現在剛在重新爆發革命鬥爭的高潮。

最近幾月的經驗，鐵一般的證明這件事。中國偉大的革命已經喚起如此廣大的工農苦力羣衆，他們都起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民衆激憤的革命力量，決非幾個月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所能完全撲滅的。

所有這一些情形，都使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央

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這一觀察，並不帶着「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的幻想。中國的客觀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并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中國革命帶着長期的性質，但是是無間斷的性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稱爲「無間斷的革命」。

——（一）在革命性質上，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行推翻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所以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決不能有民權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勢（所謂二次革命的理論）；這一革命必然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的責任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着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因爲治者階級之間自身的衝突矛盾非常劇烈，他們的統治不能穩定，民衆革命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自發的到處爆發，而有匯合起來成爲工農民衆的暴動推翻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趨勢。這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爆發，顯然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總之，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

的進程，必然要澈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漲與低落的問題

中國革命的無間斷的性質，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裏農民暴動的高漲，就可以證明。九月間農民暴動普遍廣東湖南。雖然這種互相隔絕的羣衆自發的暴動，遭着屢次失敗，然而農民運動的爆發仍舊繼續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於更加厲害起來。十月間農民暴動又在江蘇直隸熱河山東開始了。同時幾個主要的無產階級區域，如上海廣州武漢，經過一期退落情形之後，工人運動又帶起比較猛烈的革命性質。農民運動的潮流，已經引起了工人階級鬥爭的爆發，不過暫時還比較的弱罷了。南京與武漢軍閥爭奪地盤的屠殺戰爭強盜戰爭開始之後，勞動平民反加受着痛苦，廣大的工農羣衆更加憤激。雖然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對於羣衆的革命運動非常之嚴重的壓迫屠殺搜捕，然而羣衆的革命鬥爭，却正在剛經失敗損傷的地方，陸續的繼起。羣衆正在自己失敗的經驗上，學習革命的鬥爭。

固然，過分估量革命的高漲及羣衆的革命力量組織力量，因而認爲可以有範圍內立刻的勝利，這是錯誤的；然而經過革命三次大敗之後，在現今這種反動局面之下，羣衆的革命鬥爭終於重新爆發；如果對於這種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藥不能輕恕的錯誤。

因爲革命潮流的低落條件，至少是：（一）資產階級軍閥統治的穩定；（二）改良主義的漸次實行；（三）革命羣衆之潰散與消沉。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才使敵人驚惶失措而拚命的嚴厲鎮壓。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黨，不去積極發動羣衆，領導革命潮流的發展，而以爲自然的革命高潮到來，自會勝利，那也是機會主義的錯誤。

（八）現時的總策略

現時形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

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中國共產黨應當避免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發動，那是會變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黨應當去領袖一切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之發動。所以共產主義者應當做一切農民暴動的指導者。

如果農民暴動的發動，事實上不能有多分準備起見而推遲，如果這種暴動事實上不能估量到較大範圍內的勝利，那麼，黨應當使這種暴動採取遊擊式的戰爭（不去佔領縣城或巨大的地域，長久的時期，不去費力建立大規模的軍隊等等，而以人數雖少却是團結鞏固的暴動軍，經常不斷的襲擊政府的軍隊或地主的武裝）。這種遊擊戰爭，隨後很容易發展而生巨大的農民暴動，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的範圍內奪取政權。固然，遊擊戰爭開始之後，攻襲城市，尤其是小縣城，是農民羣衆常有的傾向，本黨尤當領導這種鬥爭，使適合於戰術上的目的，襲其不備，奪其武裝，殺戮豪紳，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但是，農民暴動之後，如果專意佔據縣城而忽略鄉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發動更多更廣的羣衆，不使羣衆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權（蘇維埃），那麼，這便是軍事的機會主義。

至於城市之中，則遊擊戰爭的策略，比較起來要難實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適宜採用這種策略的時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經最終決定舉行暴動，巷戰已經開始，那時，黨才可以運用這種遊擊戰爭的策略。然而現在在一切工業區域，已經要建立工人的武裝隊自衛隊，訓練戰術，利用他們在常日的反抗黃色工會的鬥爭之中；這已經是工業城市之中現時所不可遲緩的任務之一了。城市暴動的必須條件是：工人羣衆的革命高漲及革命情緒——工人日常經濟鬥爭的加緊與擴大，形成總的政治鬥爭；（二）治者階級統治之動搖崩潰的形勢；（三）一般市民（中層階級）的慌亂猶豫搖動，對於治者階級厭惡而反對，甚至於同情於治者階級之顛覆；（四）工人階級之革命力量之組織，技術上的準備。因此，黨不但不應當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謂軍事工作之準備而忽略各市以及各縣工人手工工人店員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之指導與發動，而且應當更加加緊這種鬥爭，每一次極小的鬥爭之中，也要引導工人羣衆去了解暴動奪取政權之必要，及與農民暴動聯合推翻統治階級之必要；這樣，於是切實的在政治上準

備城市之中暴動，關於工人暴動與農民暴動的聯絡關係，是黨的最重要的責任，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贊助，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獲得最終勝利的；但是，這種聯絡，只有經過黨的組織與規定計畫。羣衆的暴動，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要適合當地的環境與時機，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沒有立即暴動的形勢中，而以軍事投機的方式做軍事上的互相影響。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做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羣衆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爲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再則，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下，可以發生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是軍事投機主義，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發動，固然是軍事投機主義，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不以發動羣衆爲根本政策，不相信羣衆的力量，而只相信軍事的力量，只知道軍事上的佈置準備攻守進

遇的規畫，因此，暴動之中只見軍事的行動，并不充分發展羣衆鬥爭的根本工作。二是藉口準備的不充分或者採取等待政策，而不發動當地的羣衆，甚至羣衆已經多數的起來暴動，尙且對於領導這種暴動仍舊是怠工或動搖猶豫，這種傾向的不信任羣衆力量，不發動羣衆的政策，甚至限止羣衆自發的鬥爭，可以使黨在羣衆之中喪失政治生命。黨對於這兩種錯誤的傾向應預先指出他們的危險性而努力掃除之，中國共產黨對於民衆暴動的責任，固然是使他儘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組織性，但是，一切羣衆自發的鬥爭，即使是黨所認爲過早的，黨也有起而領導之責任。

最後，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一般貧民苦力羣衆（小資產階級羣衆）應當盡力吸引他們參加工農的鬥爭，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羣衆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羣衆的劇烈的革命行動。

現在雖還沒有到總暴動的時機，而黨的任務却正在於

努力鼓動各地城鄉革命的高潮創造總暴動的局勢。黨不但是要努力去組織農民自發的暴動，而且要去領導貧苦農民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領導他們匯合而成總暴動，獲得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勝利。

（九）蘇維埃的口號與工農政綱

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性質的政權，只能在蘇維埃制度的形式裏建立起來。黨應當在文字口頭的宣傳上，對於最廣泛的羣衆解釋：「爲建立工農兵手工工人城市貧民代表會議政府，而實行革命鬥爭的必要。」（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但是，只有確實無疑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巨大高潮，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只有到了這種時候，方才可以并且應當組織蘇維埃，以爲革命的政權機關。這所謂「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是說暴動在一定區域內已經有固守較長時間的可能；只要有這種可能，便應當建立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只要暴動真正是發動羣衆的，那麼，暴動勝利時，這

便是事實上不能不執行的任務。至於遊擊的農民暴動，還只在襲擊移動的時候，當然，那組織暴動的當地革命委員會，繼續以臨時政權的性質為暴動之指導機關。總之各地農民暴動的發動，應當以當地農民的秘密團體（農民協會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員會來指導（城市暴動便是工會等推舉的革命委員會），應當盡量發動羣衆，引進更多更廣大的羣衆參加，實行自動手（「民衆式」）的沒收土地，殺戮豪紳，工賊，摧毀中國一切舊社會關係，實行遊擊式的戰鬥——解除敵人的武裝，組織工農革命軍；這種暴動在一定範圍的區域內得勝而有固守的規畫之可能，便應當建立蘇維埃（農民代表會議）；如果已能佔據城市一縣或數縣，以至於一省，工農暴動已經聯合起來而獲得勝利，那便有建立蘇維埃之必要。城市中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廣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員的羣衆；城市暴動一開始，甚至尚未開始之前，已經要有羣衆鬥爭組織的雛形，如總同盟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大會，革命委員會等，要積極領導這種羣衆鬥爭的組織，使成爲革命的暴動的中心機關，實行革命暴動獨裁的機關。暴動勝

利一有鞏固的可能，這類的羣衆組織便應變成蘇維埃，而爲革命的政權機關。暴動的勝利，只有在建立蘇維埃的過程中，能使工農羣衆真正自己獲得政權，而更加盡量的來發展革命鞏固革命的勝利。——所以蘇維埃的組織既不能在勝利絕未鞏固之時開始，因爲這可以陷於忽略軍事戰鬥而專事選舉，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成見，因而減弱革命的獨裁制以至黨的領導權之危險；蘇維埃的組織也更不能藉口於軍事尚未了結，基礎尚未穩固，而延遲推宕，因爲這便更加要增長暴動中的軍事投機主義，這便將工農暴動完全變爲軍事行動，只去攻城奪地，只知道軍事上的規畫。

一初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是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城市貧民應當包括工匠手工農業者及一般非剝削者的小資產階級。

黨應當在鬥爭的過程中組織農民於農民協會等類的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依各地的情形羣衆的信仰而定）。這種農民組織必須是貧苦農民羣衆（破產貧困之自耕農，佃農，雇農，失業農民）之階級鬥爭的組織，

且是暴動的組織（決不能視為類似工會的經濟的組織）。然而黨應當確定方針：暴動勝利之時，要農民協會變為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現時就應當宣傳蘇維埃的口號及農民協會的過渡作用。所以蘇維埃口號並不與組織農民協會相衝突，可是「鄉村政權歸農民協會」的口號，應當取消，蘇維埃口號之外，還要團結農民於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農民暴動未發動的地方，秘密的農民團體是需要的，本黨應當引導他們到抗租抗稅不還債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沒收土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總方針，已經載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之中。黨應當堅決的反對一切機會主義份子猶豫圓滑的修改或認解土地問題上的黨的主張。土地革命的主要口號應當是：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稅，取消一切苛約、重利債務，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堅決的反對用減租、沒收大地主，打倒劣紳惡地主等改良主義的口號，來替代上述的革命口號。本黨應當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衆式的性質，極端嚴

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遊擊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蘇維埃口號以外，還有勞動問題黨綱：八小時工作制，絕對的增加工資，規定休息日，社會保險，要求監督生產等。再則，應當對於工人羣衆及城市貧民解釋，並且要在暴動勝利之時實行下列的事：例如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厲行勞動法，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改良貧民生活，如建築工人貧民住宅等。只有在這種革命的口號之下，本黨才能組織被壓迫羣衆的暴動，而得到勝利。

（十）反對軍閥戰爭與軍事問題

反對一切軍閥戰爭的問題，是中國現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贊成中央最近所發反對軍閥戰爭的宣言，認為對於軍閥戰爭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的政策，是非常之對的。「失敗主義」便是要使交戰的雙方軍閥都失敗，因為軍閥的失敗崩

潰，就可以開展羣衆革命運動的環境，而使工農暴動容易得勝。 本次擴大會議更特別的指明：失敗主義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舊軍閥戰爭的時候，對於本黨是天經地義。

對於勞動民衆、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的統治，與白崇禧唐生智汪精衛的統治是一樣的。 北方軍閥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盤剝者，是最大的官僚買辦資本家的代表（商業資本與重利資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權）；南方軍閥是豪紳地主（重利盤剝者）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

他們雙方雖然現在還是反動之中互不相同的種類，可是工人階級及農民對於他們的態度是一樣的。 本黨的任務，便是在一切軍閥戰爭之中，努力將這種軍閥戰爭變成革命戰爭，將這種屠殺掠奪的戰爭變成勞動民衆反對富豪軍閥的國內戰爭。 本黨應當向勞動工農民衆解釋的，對付軍閥屠殺戰爭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農兵士羣衆起來實行推翻自己當地的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之革命暴動。 本黨應當組織羣衆以備暴動，在優越的時候發動羣衆而指導他們暴動，領導工農羣衆起來奪取這些混戰殃民的軍隊的槍支武器。

中央認爲必須更加加緊在一般廣泛的平民羣衆之中做反對軍閥的宣傳。 「反對戰爭」的口號，中央認爲是對的。 但是宣傳這一口號的時候，必須解釋，要能永久消滅這種軍閥的掠奪戰爭，只有勞動貧民的革命勝利，而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軍隊之中的革命工作，因爲戰爭的關係，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緊破壞這些軍閥軍隊的工作。 中央現時特別指明：雖然中央政治局屢次提及這一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到處受摧殘，或者簡直沒有做。 農民暴動屢次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認爲就是這一工作沒有絲毫成績的緣故。

本次會議現時特別命令各級黨部立刻開始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的秘密工作。 除主要的革命口號之外，軍隊中的宣傳，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餉項，要求發清欠餉，給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廢除肉刑，反對軍官侮辱兵士，兵士監督軍官的財政收支等等。 本黨應當號召兵士參加工農暴動，沒收軍閥財產，兵士派選代表參加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的政權。

同時，中央認爲必須特別指出：中國革命總經驗，尤

其是屢次失敗的教訓，都證明要使中國現在的僱傭軍隊，變成革命鬥爭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動勝利而有可能組織正式的革命軍隊的地方，本黨應當組織完全與僱傭軍隊不同的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組織上的主要原則，便是志願兵制度，工農革命軍的主要成分，應當是階級覺悟的革命的工人和農民。黨代表政治部的制度，應當在新軍隊的各級組織之中建立起來。新軍隊中應當有集權的軍需供給的機關。新軍隊的名稱定為工農革命軍。

(十一) 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八七緊急會議以來的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階級鬥爭劇烈的時期，這種情形自然的結果，竟使本黨以全力去指導無產階級農民的鬥爭；在這種艱苦困難的條件之下，本黨所以沒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上來。同時，正在這一時期之中，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保鏢的軍閥（國民黨）逐步屈服，實行其賣國的親帝國主義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工人苦力羣衆赤手空拳奪回來的英租界，國民黨竟歸還了英帝

國主義者，這是何等的恥辱。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經企圖使鹽務署的外國督辦服從自己，但是英國領事幾聲抗議便把國民黨嚇退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而國民黨政府一句硬話也不敢說。所有這些事實都更加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是澈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無產階級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引進極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羣衆。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應當領袖中國勞動民衆的民族解放運動，——嚴格的揭發治者階級的賣國行爲，以及國民黨虛偽的「反帝國主義」的口頭禪。本黨應當號召無產階級及廣泛的被剝削民衆起來奮鬥：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立刻撤退外國海陸軍，沒收外國資本家的工廠，企業，銀行——歸組織成蘇埃國家的中國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債——滿清政府及軍閥政府零躉出賣中國所借的外債。

同時，本黨應當經常不斷的對工人及一般勞動民衆解釋：中國人民要完全戰勝帝國主義，只有推翻治者階級，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真正的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同

時，也只有得着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

(十二)機會主義之遺毒

八七緊急會議雖然嚴厲的反對以前黨的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半孟雪維克主義的政治方針，中央臨時政治局雖然屢次糾正地方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然而黨內仍舊有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之遺毒。葉賀潮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動政治上意義的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爲前敵指揮者不是實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種主要問題上採取妥協的改良主義的方針（只提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張減租到收穫百分之三十，不注意農民羣衆的革命宣傳，不准工農自動的獨立的實行殺戮豪紳地主反革命派，拋棄徵發沒收地主豪紳財產之政策等等）。軍事上很壞的策略，也表現前敵黨的指導，沒有革命的建議力，沒有果斷的意志和方針。許多次的農民暴動之中，指導者猶豫動搖，沒有革命的堅決的意志，都是多次失敗的主要原因。這種機會主義的特點，便是不相信

羣衆運動的力量，不去依據工農民衆，而總想依靠不住的軍隊力量，總只想做勾結雜色軍閥的把戲。中央這次會議認爲必須以全黨的力量，來排除這種危險的致命的機會主義之遺毒，這種機會主義遺毒猶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黨的指導幹部是非無產階級的成分，本次會議命令各級黨部立刻用最堅決的方法，使指導幹部工人化，肅清其中的機會主義的份子。要知道最近兩湖廣東及葉賀南征的失敗，其原因由於主觀上的錯誤的占極大部分，沒有強固健全的非機會主義的黨的指導，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再則，本會議認爲還要預防黨內別一種危險傾向發生的可能，——這種傾向便是對於工人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部分要求的鬥爭，職工運動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實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不但和指導部分要求的鬥爭的工作不相衝突，而且更加要黨積極的去領導工人階級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鬥爭，——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使共產黨發展成爲羣衆的革命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一五三

（本草案爲立夫同志所擬，要大家公開討論，以待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作最後的決定。同志等如有意見，修改或增補，理論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個草案，都可以在本報刊布。）

結言

中國共產黨認爲：中國鄉村之中地主豪紳富農的成份不在少數；他們依據自己的暴力機關（民團、團防、商團、軍閥的軍隊，以及他們所勾結收買的土匪），他們依據帝國主義的助力，對於土地制度之革命的變革，竭全力以抗禦。

中國共產黨認爲，只有農民最劇烈的階級鬥爭能夠消滅勞動民衆敵人的經濟政治上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爲，只有用最「民衆式」的階級鬥爭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實行革命的變革土地制度，組織鄉村中的農民代表會議政權，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府。

在這一鬥爭之中，苦力和雇農將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堅決的反對並駁斥一切蔑視雇農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論（如謂農民運動不應是「流氓地痞」的運動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組織苦力雇農於階級的組織之中，引進他

們的代表參加革命政權之指導機關。同時，中國共產黨要盡力吸引鄉村中的中農份子，使他們站到貧民方面來，這些中農也是要推翻舊制度的。

中國共產黨認清這一鬥爭是非常之艱巨的，但是，同時要指出：廣東湖北湖南的農民已經在本黨指導之下實行許多次英勇的武裝暴動，這種情形證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經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共產黨要組織農民於農民協會等類的戰鬥的組織之中，竭全力以贊助農民的一切鬥爭，宣傳以城鄉勞動民衆武裝暴動而建立蘇維埃政府之主張，並且在羣衆運動相當的階段上進而組織蘇維埃。

中國共產黨認明：農民之中對於國民黨的幻想迅速的消滅，國民黨欺騙民衆的甚麼減租百分之二十五，減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張，無論甚麼地方也不能實行，即使實行也決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要堅決的反對國民黨欺騙民衆的政策。

各省紅槍會等類農民組織的發現，以及這種組織的奮

起鬥爭，也就證明農民了解武裝鬥爭之必要。中國共產黨要努力去肅清這些組織之中的反動份子，肅清農民意識裏的反動遺毒，努力去改變這種組織，使成爲真正階級的組織，能爲自己的解放而奮鬥，共產黨員應當到這種組織之中去進行適當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要組織農民，實行同盟抗租罷稅不還債拒用無價紙幣和軍用票等類的紙券，並且要竭全力去贊助這種鬥爭。

中國共產黨組織農民羣衆反對軍閥戰爭的鬥爭，並且贊助農民自發的這種鬥爭，反對軍閥的徵發拉夫派糧等等。中國共產黨在每一次這種鬥爭之中，宣傳農民武裝暴動以反抗農民之階級仇敵的必要。

(一)

中國的農業經濟與土地關係，不但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歐美不同，並且和歐洲中世紀時代（資本主義前期）的土地關係也不同。這種差異的最重要的前提，實在就是中國生產之自然界的環境與中國歷史發展之特殊條件。中國農業生產的方法上，有許多特點，使農村經濟呈特殊的

狀態，這些特點就是：自覺的整頓水利之重要（必須人工灌溉），多量的開水旱器械與建築之必需，中國本部之主要區域沒有畜牧事業，農村經濟中用以耕種的牲畜比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絕對沒有停耕若干時間以與地休閑之辦法，必須耗費多量的徒手勞動。如此的農業生產方法，再加上商業重利資本的早期發展，防禦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災必須巨大的工程（如長城運河黃河河工隄工等），應付天災必須有種種救濟組織，對於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們，強迫他們變成農業民族；這些情形綜合起來，便造成中國這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就是馬克思列甯所稱爲「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制度。中國如此之多的的小農經濟，實際上不相關連，可是中國很早便有貌似統一的國家政權，這種國家政權的物質基礎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國官僚制度的作用向來非常之大，這個原因便在於此。中國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業重利資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們並且就是直接實行重利盤剝和大商業的本人。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閹閹專有土地的制度（如貴族閹專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國已經很早就根本崩壞了（秦始皇之

後，約當基督紀元前三世紀）。此後經過很長期的無政府狀態，經過非常殘酷的階級戰鬥，然後最終的形成所謂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中國的國家便從細小的許多諸侯采邑變成亞洲式的專制政權，有極發達的官僚制度。農業與農民的家庭工業（紡織等）相聯結，又使亞洲式的生產方法有很大的內部穩定的狀態。商業重利資本，對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地方市場，互相關聯很薄弱的地方市場，有極大的威權。諸侯采邑閉關式的土地制度崩壞之後，中國的土地關係經過許多種的變更，都是由於種種歷史形勢而來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來的影響，或者經過很大的民衆運動，各地市場關係之擴大或縮小等等。可是農業勞動的方法，根本是沒有變更的。中國農村生活的特點是：人工灌溉有能決定一切的重要意義，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業重利資本有密切的關聯，歐洲中世紀所未有的地主與商業重利資本大規模的剝削農民，土地使用時分割得非常之瑣碎細小（同時，並不妨害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資本主義前期式的地方市場對於農民經濟有相當巨大的威權。過渡於新的生產方

法，發展全國的生產力，農業技術的進於更高的階段，在現時都阻礙於這舊社會制度的遺毒。

（二）

中國各省的土地關係並非一致相同的。本黨各地黨部應當細心研究各該省的土地關係，必須估計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經驗，適應各該區域特別的情形，而實行黨綱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絕無疑義的是佃農及半佃農（粵桂鄂湘閩浙等）。北方有幾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農（晉直）。殖民地區域的土地關係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龍江等）。中國共產黨認為必須宣言承認內蒙古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一直到分立國家，並且要極力贊助內蒙國民革命黨力爭自決的鬥爭。對於回族地域，本黨也應估計當地特殊的土地關係。中國有幾省還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黨應當努力奮鬥，消滅對於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種種方式的剝削，而贊助他們進於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農民分做三種：一、佃農，二、自耕農，三、半佃農

。三種農民之中，都有貧農，小農，中農與富裕農民的區別。分辦農民中的這些種類，在農業生產方法的條件上，必須不僅以生產範圍（耕地畝數之多寡）為標準。

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穫次數等，都要估計到。

各種農民之中，在中國本部最大多數是貧農和小農，貧農和小農都是每年收入不夠維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這些農民在各省之中有的佔百分之五十，有的佔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農民只是農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盤剝，剝削僱傭勞動，出租耕牛及農具，強租貧民田地，或者將自耕所餘田畝出租，兼營農業，商業或農村副業，與鄉紳及官署有交往聯絡；這些事情，富裕些的農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農雖然少，而他們在農村之中却比較的有些勢力，當然他們的勢力比地主商賈重利盤剝者的勢力要小得多。

中國閥閱制度（貴族）很早就消滅，族長制度有很大的影響，地主家族裏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現時更有地價高漲的情形，農村中的資本流入城市商業，變成重利盤剝的資本；這些情形使地主階級之中的中心人物並非大地主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貪狠，他們對於佃農剝削的殘酷，並不讓於大地主，甚至於有過之無不及。表面上宗法社會的舊俗，不能使佃農的地位比較好些，反而更加壞些。除地主，商賈，一部分富農，重利盤剝者之外，中國農村中的剝削者，還有土豪鄉紳也有同等的重要。鄉紳雖然常是有田地的，兼營商業和重利盤剝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論，他們是多餘的智識分子，專靠農民的餘剩生產品而生存，他們用租稅謀捐的方法，有時簡直用強迫貢獻的方法，榨取農民的餘剩生產品。他們是官署與農民生產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團一樣，亦是壓迫農村勞動平民的寄生蟲的暴力機關，這些寄生蟲是反動勢力在鄉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產，都被治者階級所霸佔。祠田族田廟田等的收入，都是鄉紳所榨取。地主商賈鄉紳所辦的公司，或者各個軍閥鄉紳重利盤剝者，都能以極賤的價錢收買屯墾的官地。治者階級霸佔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廟宇田產的收入，更加增加他們的權力。

（四）

中國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穀物，並且大半的習俗是佃農有永佃權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論，都沒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地主的對手方，極大多數並不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租戶，因投資於農業有承租地畝的；地主的對手方，都是窮餓的農民，租田耕種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幾省（粵、蘇、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極少數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租戶。地主對於佃農無限制的剝削，一般而論，都已經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將「絕對地租」與「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設備中所放資本的利息都拿了去，並且連佃農所耗費於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處所有名詞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經濟名稱），不但如此，甚至於將佃農生產者及其家族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農的收入，往往低於他們維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數目。但是，除出這種習慣上舊式的剝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關係也在發展起來。地主竭力在設法使永佃權變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為短期的租佃。舊式以穀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習慣，都漸漸的變成新的方

法。鐵租（每年不論豐歉，佃農須交一定的租額）的辦法已經很廣泛。押租（佃農預先交納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種田地）的辦法，也在實行起來。這些新方法之外，舊時的剝削方法仍舊保存着。佃農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報酬非常之少，佃農一定要替地主送禮，有種種奇怪的名目，還需請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農欠債之後，便要替地主當奴隸（廣東山東），賣男賣女還欠租，不能還租的佃農須要坐監牢（廣東浙江等省），土豪民團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農，或者是因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類的剝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國中部各省（江浙皖贛等），租佃關係之中有所謂「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農有田面。這種情形大半由重利盤剝而來的，或者是由於佃農代墾地主荒地而來的。中國永佃權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顯的證明中國農村之中並非資產階級式的私有制度占優勢。直到最近，地主方才開始用全力奪取那種「共有田地」的所有權，要想使舊式的「共有田地，變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礙於剝削的舊式的永佃權及收租時的舊習慣（荒年照例減租，每年只收一次收穫的租，貧民可以自由檢拾稻場上遺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變更舊式的亞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爲比較現代式的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然而農民的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變成農民所有。

（五）

貧農小農甚至中農所有的土地，僅僅是形式上的所有權罷了，形式上享有這些田地的生產資料罷了；其實治者階級用課稅貿易誑騙種種方法，不但將「佃租」收去，並且收地價的利益之極大部分，甚至於將農民生產者及其家族所應得的工資之極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農佔多數的省份，現在也在自耕農迅速的變成佃農的過程之中（山西河南）。賦稅的壓迫，經常不斷的軍用徵收，根本破壞農民的經濟。軍閥的戰爭，匪亂的蔓延，商業交通的停滯，往往造成地價暫時低落的面貌。地主軍閥官僚商賈豪紳得以大批的收買田地，使自耕農變成佃農。時常不斷的災荒（直隸、山西、山東），預徵錢糧，每年勒捐

數次，更使重利盤剝的現象加增。重利盤剝者強逼農民將田地零星的抵押，農村中的治者階級用種種方法掠奪農民的所有權。自耕的農民變成佃農。

（六）

水力的使用上，也有極劇烈的階級鬥爭。地主竭力搶奪灌溉水力的支配權。商人的公司或豪紳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農民付錢買水。農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個小農經濟沒有能力改良水利，開闢水源，甚至於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農民生產的最重要的前提），於是他們總是想望國家政府來解決這一問題。農民可以深切的明瞭：只有勞動者的政府能夠實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應用新發明的技術。

農村之中金錢貨幣的勢力日益增加，於是重利盤剝者的威權也就擴大。農民之中最貧苦的份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於連維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資財也沒有。天災戰禍，因而不斷的破產失業，還要履行種種舊習慣中糜費的禮節（婚喪趕節等等），都使農民不得不向重利盤剝者借錢。借錢的利息

，從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盤剝之中還有一種借貸穀物的辦法，這種辦法的殘酷更是無以復加，簡直是公開的掠奪農民。收穫前借一石穀，收穫後便須還一石半，甚至二石穀。收穫前幾個月借的債，收穫後即須照全年付利還本。荒年天災的時候，重利盤剝甚至於可以剝削到幾個幾十個的村莊，剝削到全體的農民。

軍閥的統治根本破壞農民的經濟：他們的重稅雜捐，軍事徵用，派軍封船，派糧，拉夫，拉馬匹等等，完全是破壞農民經濟的。地主還要轉嫁一部分賦稅雜捐到佃農身上，以及一般農民身上，這種稅捐一年之中收到兩三次，甚至於六次。釐金雜捐式的關卡無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轉嫁到農民身上：輸出時，商人因為估計所負捐稅，而更加抑低收買原料的價錢，如此轉嫁稅捐到生產者身上；輸入時，又如此的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軍閥制度之下，以前徵收賦稅的舊習慣與相當的限度，完全消滅了；中國貧苦農民所負租稅，遠過於普魯士或美國的農民。鉅商地主與官署勾結，並且有些權勢，反而可以比貧民少担負些。地方稅的種類和數量都在日益增多。

再則，農村的破產使匪亂日甚，匪亂的蔓延又使農村破產更甚。

帝國主義對於農民經濟市場的權威，也更加厲害更加深入。外國工廠生產品的輸入，機器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式的手工工場及家庭工業的發展，都使帝國主義侵入的地方農民舊式的家庭工業（紡織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擊。同時，農業與家庭工業相聯合的中國舊經濟基礎，根本破壞，其崩壞的速度，比工業的發展快得多，農村中多餘的勞動者因此沒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極大多數的失業羣衆的到城裏當苦力，變成土匪，流入軍閥的軍隊，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羅南洋羣島，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滿洲蒙古去。

帝國主義的侵入，使農業中各種種植的分配，大有變動。例如茶的出產，因為印度爪哇資本主義式的茶葉大農場競爭的力量很大，日本茶葉生產的組織也比較的好，中國自身則釐金雜捐日多，所以中國茶葉生產大受破敗的影響。種蔗的生產也是如此，爪哇台灣等處蔗業大農場之競爭，外國糖的輸入，都使中國蔗業生產衰落。

歐洲化學工業的發展，破壞了中國土皖的生產。帝國主義的侵凌，以及中國本國紗廠絲廠的發達，使國內植棉種桑的地畝大增，然而歐戰之後，中國棉業受着美棉印棉的競爭，小農的棉場自然抵敵不過——中國小農還受着重利盤剝者的壓迫呢。中國重利盤剝的資本家本來正在努力侵入與工商業有關的農業之中來。製油植物的種植也大大的發展；但是與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類菜類同時輸出的本來還有一種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餅。滿洲方面輸出於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餅。同時，種植鴉片及烟葉的地方也多起來。英國帝國主義用槍砲強迫輸入鴉片於中國，完全是爲着賺錢。現在軍閥便強逼農民種鴉片，以便他們抽收鴉片稅。福田多變成鴉片烟葉等的田。水利不整頓，灌溉的設備破壞，於是農民往往不能不將稻田改種番薯（馬鈴薯）。貧民的食料一天一天變得更壞了。

商業却日益擴大起來，但是盡在舊式的商業方法的範圍之內。貧農和小農不得不在收穫之後立刻出賣穀物，簡直不暇顧及市價如何，他們只能照村中最低的價格出售

，因爲急於要付田租，賦稅，債息。等到第二次收穫以前，他們早已完全用盡了，只得出很高的價錢去買米，借米吃。商業重利資本將與工業有關係的農產品（絲，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們用極低的價格向農民生產者收買這些農產品。農民中最貧苦的份子受着市場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場的絲毫好處，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處。與工商業有關的農產品之極大部分的利益，是國外貿易的輸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國商業重利資本所得的。鄉村中的貨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價，中國的貨物流出國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價。

這一過程，因爲帝國主義霸占鐵路內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擴大商業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前提，於是更加厲害。外國財政資本引起中國的採取工業（煤鐵等礦），後來又發生幾種製消費用品的工業（如紗織，烟廠，榨油，食物製造，釀酒等）。農村中剝削所榨取出來的資本，投入運輸業商業，亦有些投入工業。

但是，同時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協定關稅，國內

市場容量的有限，軍閥統治，貨幣制度的不統一，財政機關的混亂，商業重利資本的優勢等等，都阻礙工業的發展；頻數的經濟恐慌使資本溢出生產範圍而停滯，甚至於商業之中也不週轉，於是這些資本及城市中一般積蓄的錢財轉而購買田地及經營重利盤剝，於是小地主的數量增多而農民之佃農化的過程更加急。

帝國主義利用銀價的低落掠奪全中國。中國的銀行家鉅商及重利盤剝者受着了這種損失，便轉嫁給農民生產者。同時，在歐戰之前便開始一種過程：農村中及城市貧民中最流通的貨幣（銅元）之價格，日益低落，歐戰之後這一過程繼續的厲害起來。銅元的購買力，因為軍閥政府的濫鑄，而日益低落。再則，軍閥政府發出許多紙幣，軍用票國庫券等等，這種東西過不了幾天便不值錢了，使農民及城市貧民受鉅大的損失。銀行公司及單個的商賈，也各自發出紙幣剝削農民。中國經濟日益成爲貨幣經濟，然而鄉村城市中流行的貨幣，仍舊帶着資本主義前期的貨幣之種種特質。

中國農村中絕無因地的農民有極重要的意義：苦力，

雇工，船夫，漁夫等。做搬運夫的苦力有好幾百萬，土木作及其他農業工作的苦力也不少。這一階級是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始祖，昂格思所稱謂「前無產階級」的。他們受着最殘酷的剝削。他們往往幾星期幾個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們的境遇更加苦。

農民的失地和農民家庭工業的崩敗，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貧農小農所耕田地非常之瑣小），都使苦力農場工人的數量增加。中國條件之中，播種灌溉插秧等工作時，甚至於小農都不能不添請別人幫助。富農等便可以雇用長工。有些地方，地主給農具種籽牲畜，叫雇農替他耕種，收穫之後雇農只得極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資。這種農民，中國亦稱謂佃農，其實已經是雇農。他們的地位很像半奴隸的農奴，却不像現代的農業無產階級。按日計算的雇農，或者按期雇定的雇農，一到田忙過了之後，便無從找着工作。

對於農村的剝削，最近還有些新的方式發生。舊式的家庭工業，如織絲等，現在固然已經崩敗漸滅；同時，却發生新式的家庭工業，爲領取資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織布

，製花邊，繡花，製草履，製帽，製扇，製傘，製中國舊式的估衣等……這些新式家庭工業，大概有商店定製包銷，對於農民，尤其是農婦的剝削非常之厲害，他們所得工資簡直不能養活。

中國捲入國際貿易的漩渦之中，帝國主義獲得中國經濟的最高權，中國勞動民衆受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地主官僚商業重利資本聯合的統治，交通與工業之中資本主義的原素增加，舊國家的崩壞，軍閥制度的發展，凡此一切對於舊式生產方法給了非常之鉅大的打擊，根本上使他崩毀。

然而同時要過渡於新的生產方法，却有許多困難與阻礙：一方面帝國主義阻礙中國的發展，別方面地主及商業重利資本依靠着帝國主義及舊官僚機關與軍閥軍隊的權力也阻礙中國的發展。帝國主義利用剝削中國勞動民衆的舊方法去剝削全中國，中國的治者階級又在竭力鞏固剝削民衆的舊方法，還要運用剝削民衆的新方法，以穩固自己的威權和地位。

所有這些情形結合起來，便形成中國農業的一般的衰落，收穫減少，舊時的水利設備破壞，天災頻數，水旱飢

荒相繼，農村破產，土匪騷起已成一般的現象，重利盤剝的加重與擴大。階級鬥爭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來。

舊社會制度崩潰下來，漸滅下來，而過渡於新的生產方法便只有兩條路：資本主義的與非資本主義的。

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之中造成鉅大的生產機關，應用極新的技術，列強竭全力以互爭世界市場，互爭銷售貨物與搜取原料的場所，財政資本運用極新式極鉅大的軍事技術機關及海陸軍以爭奪市場，以服征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時期之中帝國主義剝削與新舊軍閥壓迫之下的中國，只能夠非常痛苦遲滯的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而且必須外國資本輸入中國的速度大大的加增。

資本主義的道路對於中國，就是幾千百萬農民苦力之死亡，幾百萬女工童工在工廠之中磨折慘死，流血的掠奪的戰爭（如此的混戰局面之下，軍事上簡直不用甚麼技術器械相鬥，而只是用幾千幾萬人的性命爲犧牲，以相搏戰），極鉅大的天災水旱，極殘酷的剝削工人，陸續相繼的國內戰爭，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礦山鐵路租借地，瓜分勢力範圍，或者簡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

的幾輩工人相繼死滅，一般勞動農民的死亡，全國人口的大減少。從崩潰的舊中國社會非常遲滯痛苦的轉入新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道路，便有這些不可避免的結果。

第二條路——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便是勞動民衆反抗中國治者階級與帝國主義之聯盟統治的極艱苦的鬥爭，以羣衆的武裝鬥爭統一中國解放中國，推翻帝國主義，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除盡一切種種的剝削者，將勞動民衆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從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與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運動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經過第一期艱苦的鬥爭之後，運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之補助，而進於新式技術的生產方法，工業農業大大發展，造成新的習俗，提高一般民衆的文化程度，行向勞動平民解放後之光明的將來，自由的勞動，一直到進於自由世界，沒有一切階級的世界——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要聯合農民及城市貧民，組織並準備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以推翻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及其代表之軍閥官僚的政權，而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以實現第二條道路，非

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認爲要澈底變革中國的土地制度，必須肅清一切崩潰混亂的舊社會關係，所以主張爲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起見，必須實行下列的辦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無代價的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沒收的土地之實際使用權歸之於農民。租田制度與押田制度完全廢除，耕者有其田。

三、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是鄉村中的革命政權機關，牠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舊時佃農中的富裕者不能變成富農，並使革命軍隊的戰士及無地的農民能夠分到土地耕種。同時，共產黨要努力實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會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產等類的土地，一概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產旗產的土地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共產黨要贊助農民去根本消滅這一種陳腐惡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歸農民代表議會支配；並且要努力設法，使實行墾殖政策時得有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以及工農軍的兵士。

七、一切豪紳反革命派的財產完全沒收。

八、農民代表會議要措籌基金，保證無產而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廢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礦產完全歸蘇維埃國家所有，蘇維埃國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當設法保護森林種植森林，並開採礦產。

十、整頓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農民代表會議執行，井泉溪沼等完全歸農民使用，農民經過農民代表會議而行使這種權利。

共產黨並認改良水利擴大灌溉源流，採用新式技術機器電力等，為自己的重要職任之一。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運動。

十一、共產黨要努力設法實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

導河填築淤地築造牧場等等；並實行預防飢荒的設備。

十二、一切苛約重債一概取消。共產黨要組織低息的農業借貸，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民之借貸合作社。

十三、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合作社運動：銷售農產品及農民之家庭手藝產品，販賣農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藝的原料等。共產黨要發展工業而使農民得着廉價的現代新式的農具。禁止販賣肥料的私人壟斷，——販買肥料歸農民的合作社辦理。共產黨還要實行鄉村中築路修道的建設事業。

十四、軍閥政府的一切賦稅，完全廢除，釐金廢除，包捐包稅的制度廢除。革命政權重定單一的統一稅制，稅收的一部分應當作鄉村的公費。一年只在收穫後收一次稅。確定統一的貨幣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頒佈保護履農苦力的法律。政府當以發展工業而開辦公事業的種種工程，修築道路，獎勵農村手藝，以保障苦力失業者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開除譚平山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中國共產黨此次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議決開除譚平山，其理由具見於「政治紀律議決案」，茲錄此議決案中關於開除譚平山一段如下：

「譚平山同志自本黨第五次大會後當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另組織第三黨，並向智識份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及另組織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

央許可私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呈請書內復大罵農民運動棘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至九江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勵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的反黨空氣，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員中；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而後通知或逕不通知前敵委員會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土地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